

# 甘肃省志

第六十一卷

## · 社会科学志 ·

(古代至一九九〇年卷)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甘肃人民出版社

# 甘肃省志

第六十一卷

## · 社会科学志 ·

(古代至一九九〇年卷)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甘肃人民出版社

#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 组成人员

主任：陆 浩  
常务副主任：李 膺  
副主任：陈田贵 安晨光 孙公平 李保卫 金庆礼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少青 马永孝 马光明 王 义 王 杰  
王继光 田宝忠 白继忠 刘广达 张生桢  
张志银 李 峰 李清凌 李沛文 李建华  
杨 诚 杨咏中 杨建新 沙拜次力 苏志希  
邵克文 周云凝 周多明 周德祥 武文斌  
赵 春 高清和 黄选平

##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任：金庆礼  
副主任：王 杰

## 《甘肃省志》

主任：金庆礼  
副主任：王 杰

#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 历任成员名单

名誉主任：张吾乐

主任：王秉祥 陈绮玲

副主任：吴治国 吴文遴 徐宗望 李文辉 毛敌非  
韩志德 陈绮玲 穆永吉 姚文仓 程有清  
汤九夫 徐尚和 张天理 夏荣生 王在鹏  
姚恭荣

顾问：杨植霖 李子奇 葛世英

主编：徐宗望(兼) 韩志德(兼) 杨若愚 夏荣生

副主编：李光 邵文龙 田真 王顺 魏琦  
郝玉屏 张克复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忠正 马廷秀 马学海 王平 王顺  
王九菊 王世文 王文学 王炳书 王重国  
王振军 王爱彦 王福洪 王在鹏 田真  
龙显烈 支克坚 邓成城 冯绳武 朱瑜  
石星光 权少文 汤九夫 刘汝茂 刘郁采  
刘熊祥 伏耀祖 李光 李膺 李文业  
李永彬 李宝峰 李建国 李福盛 李鼎文

谷 苞	杨干丞	杨生华	杨应忠	杨若愚
邵文龙	吴士起	吴存礼	吴泉祖	杜世昌
张 铭	张九超	张文启	张天理	张克复
张志清	张国维	张炳玉	张建基	张继武
张令瑄	陆 浩	陆润林	陈可言	陈绮玲
易 炎	周云凝	孟庆冲	金宝祥	拓稼林
姚文仓	姚恭荣	饶凤翥	赵世英	罗洪福
赵家瑞	郝玉屏	钟永棠	胡仕国	郭 琨
高旭华	夏荣生	唐立贵	贾宝忠	郭方忠
徐尚和	阎海旺	喇敏智	曹克己	康和厚
敬延年	韩玉玺	韩效文	程有清	程国仁
曾寿庆	窦 述	雷健英	裴 慎	燕 斌
霍仰山	魏 琦	魏庆同		

##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历任领导

主 任：夏荣生 王在鹏  
副 主 任：魏 琦 郝玉屏 张克复 韩博文 周云凝  
巡 视 员：郝玉屏 张克复

## 《甘肃省志》历任主编、副主编

主 编：夏荣生 王在鹏  
副 主 编：魏 琦 郝玉屏 张克复 韩博文 周云凝

# 《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

## 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马西林  
第一副主任委员 陈宝生  
副主任委员 张瑞民 安可君 周述实 支克坚  
                  范鹏 李铁成 吴仰东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西林 马廷旭 支克坚 王 钢  
                  安可君 安文华 申明海 李文衡  
                  李铁成 陈宝生 吴仰东 张瑞民  
                  张恒昌 范鹏 周述实 延 涛  
                  郝树声 魏胜文

# 《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

## 古代至一九九〇年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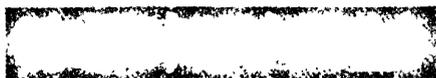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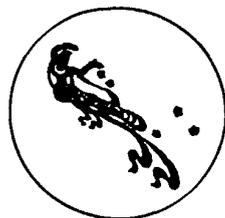
主 编：支克坚 张恒昌 马廷旭 郝树声

# 《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

古代至一九九〇年卷撰稿人

(按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王步贵	穆纪光	马廷旭	张世海	魏 静
夏 阳	鲁修文	刘文英	袁义江	晓 音
万明钢	洪 荒	陶景侃	李国杰	王廷湘
魏永理	周述实	余守安	李树基	欧阳锦
李 琼	李新文	骆进文	樊建中	宏 经
葛文华	刘 敏	陈纪常	刘永哲	郭清祥
刘学福	姚兆余	马东平	郭 弘	杨筱霭
赵以武	陈 亘	许文鹏	苏优勒	杜 林
李文瑞	黄怀璞	彭岚嘉	李瑾瑜	曾天山
陆润林	焦瑶光	宋 捷	张世林	杨爱程
毕可生	苏润余	常校珍	李功国	陈志刚
刘延寿	吴福熙	马建文	高自厚	李燕青
萨迪尔	卓逊·多杰		唐景福	马 通
张恒昌	张 行	颜廷亮	李仓涛	郝树声



# 总 序

甘 肃 省 人 民 政 府 省 长 陆 浩  
甘 肃 省 地 方 史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任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代代相续,历久不衰。中国存世方志卷帙汗牛充栋,内涵浩如烟海,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弥足珍贵,在人类文化宝库中光辉灿烂。

甘肃为羲皇故里,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夏商之际至秦、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先后崛起于今陇东、陇南、天水和河西地区的众多部落,先后建立了周、秦、“三秦”、“五凉”、仇池和宕昌等王朝或政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和明长城横亘省境,昭示着西北先民创造世界奇迹的伟大力量。汉代凿通“丝绸之路”,设郡立县,开发河西,促进了经济

率先向多元化发展,形成了空前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公元2世纪至7世纪,凉州成了全国著名的政治文化区域中心之一。盛唐时期,甘肃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阗阗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历经北魏、西魏和北周,至隋唐不断拓建而成的敦煌莫高窟,今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举世瞩目的瑰宝。周、秦、汉、三国、“三秦”、吐蕃、北宋、西夏、金和元等王朝与地方势力,先后逐鹿陇原、称雄天下,展现了气吞山河、金戈铁马的恢弘画卷。千百年来,生活在甘肃的汉、回、藏、蒙古、东乡、裕固、保安、哈萨克、撒拉、土和满等民族和睦相处,携手共进,推动了民族融合,谱写了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篇章。许多名垂青史的风流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灿若星辰。在历史的曲折进程中,晚唐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由于海路开通,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崛起,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导致甘肃条件恶化,逐渐失去区位优势,长期饱受政治黑暗、战乱兵燹和天灾频仍之苦,社会动荡,经济文化日趋萧条,民生凋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甘肃大地苦尽甘来,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旧貌换新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从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64.7亿元增长到15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07.5元增长到7376.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00.9元增长到1852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广大农民稳定解决了温饱,全省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2600多万甘肃人民在继承和发扬古老文明的基础上正在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向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地方志以特定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记述对象,纵贯往昔,横陈现状,笼天地,揽百业,被誉为“一方之总览”。就其地情信息蕴含量而言,其他任何典籍都难以望其项背。是以“治天

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各种方志补史之缺，详史之略，正史之误，既是纂修正史最重要的基础资料，又是了解一地自然条件、历史演变和经济文化建设的翔实材料，梁启超、鲁迅和竺可桢等学界大师悉心研究方志，分别在国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历代方志“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着力彰显地方经济社会人文优势，也是激发爱乡爱国之情的生动教材。在当今全球化趋势加快，中国迅速融入世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地方志又是开展对外宣传和发展中外交流的重要媒介。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虽然信息载体日渐增多，传输处理方式日新月异，但地方志作为“地方百科全书”，其载有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仍然无法为其他载体所替代。

历史是现实的累进，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物质和文化基础上传承发展起来的。人们要把握现实，开拓未来，就必须深入研究借鉴历史。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编史修志工作。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同志就指示收集整理陕甘宁边区旧志资料以资边区参考。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重览方志以知情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倡议创编新方志以为国家建设服务。1956年，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将编纂地方志列为20个重点项目之一。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从传承中华文明，推进文化基础建设，深化国情认识，促进信息开发的需要出发，于20世纪80年代初统一部署，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编史修志工作。

甘肃修志起始于北朝，兴盛于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内外共存甘肃旧志200多种。“盛世修志”，1983年5月甘肃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了《关于重视编修甘肃地方史志的决议》，1984年2月，中共甘肃省委批准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至1988年，省、地、县三级政府全部建立了地方史志编修机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方配合的修志工作格局。各级修志部门全力以赴，发凡定例，倾力采编，20年来先后出版各类新编志书、年鉴和专题丛书300多部(卷)，整理旧志30多种，为我省文化建设添绘

了重彩。

方志中以省为单位的一般称为“通志”。甘肃历史上曾多次编修通志,今存有元修《甘肃图志》、清乾隆年修《甘肃通志》、光绪年修《甘肃新通志》、民国修《甘肃通志稿》;在新时期,省委、省政府对编修《甘肃省志》非常重视。1984年组建了由全省各市州地和省直50多个部门党政主要领导同志组成的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以王秉祥、陈绮玲同志为主任的前两届编委会做了大量工作。省直80多个承编单位数千名有志于此者组成强大编审阵容,遍采史志档案,详考文物古迹,广收民间口碑,正在倾力完成这一巨帙。《甘肃省志》共设80分卷,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志》和《附录》组成。《概述》总揽全志,综述省情;《大事记》纵贯古今,摘记大事要情;各专志以类系事,分记各科;《人物志》以立传、简介和表录诸体记述入志人物生平;《附录》收录重要文献资料。各志以文为主,辅以数表、图片。全志约4000万文字,2000幅图片。《甘肃省志》的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努力运用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坚持贯通古今、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的方针,全方位挖掘史料,新视角审视历史,多角度汇述史实。在保持历史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基础上,以记述近代以来甘肃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为重点,充分反映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甘肃省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民族兴亡为己任,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赢得历史选择,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历史雄辩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繁荣富强,才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甘肃省志》是反映甘肃综合省情的基础,承载了资治决策、文化传承和舆论宣传的丰富资信,可为总结历史经验,深化省情认识,探索发展道路之借鉴。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中共甘肃

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正在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中共甘肃省委十届三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确定了甘肃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包括编史修志在内的文化基础事业,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省各级修志部门和广大史志工作者,要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开拓进取。要热爱史志工作,勤奋敬业,精益求精,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史志作品,记录伟大时代,为人民的丰功伟绩和社会主义的崇高事业树碑立传。

甘肃是多民族聚集地,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中,铸就了各族人民纯朴敦厚、诚信友善和热情豪放的性格特征,不畏强暴、刚正尚武和勇于牺牲的爱国情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和“人一之,我十之”的顽强毅力,这些优良品质,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地方史志要重视概括提炼和升华这些宝贵精神财富,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激励陇原儿女开拓奋进,走向壮丽美好的未来。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我国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甘肃省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4000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000元左右;使全省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我们深知,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面临许多挑战,需要加倍努力,不懈奋斗。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不断深化改革,激发全社

会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坚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建立更加开放的市场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坚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施工业强省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把做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协调发展,实施科技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符合省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甘肃振兴的宏伟目标。

2005年11月



# ·社会科学志·

## 古代至一九九〇年卷

# 前 言

支克坚

《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试图按照志书的一般要求反映一个特殊的对象，即较为全面地反映甘肃社会科学自古到今发展的面貌。应该说这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一种重视社会科学的传统。在我国古代的漫长岁月里，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曾经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进行过紧张的思索，包括对于自然的思索和对于社会的思索。其中对于社会的思索，形成了系统的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在广义上，这就是我国古代的社会科学。它既是造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也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历史进入近代和现代，人们对社会科学更有了新的认识。这正是社会经历

重大变革、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站在历史前进潮头的中国人，自觉到必须有能够作为变革的武器的社会科学。他们先是四方求索，于是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传入，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终于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旧中国因此而天翻地覆。今天，我们又有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国人民正高举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奋勇前进。

甘肃虽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定的辉煌和繁荣，但总体上属于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地区，社会科学生长的土壤是相对贫瘠的。但它毕竟是一个统一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我国古代社会发展每一阶段上意识形态的特点，在这里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而且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并没有妨碍它有时开放出社会科学的奇葩。要言之，古代甘肃社会科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也自有其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为前所未有的。国家确定了思想文化工作的方针，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给予了明确的指导。在机构、队伍等方面，都既有长远的规划，又有具体的安排。甘肃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时更完全融入全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之中。由于基础十分薄弱，除了个别学科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曾经有过例外，总起来说，它是跟在全国后面走的，它只能跟在全国后面走，也不能不跟在全国后面走。正确的要跟，错误的也要跟。所以，这段时间里甘肃社会科学所走的路，绝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待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甘肃社会科学也同全国社会科学一样，科学的思想遭到否定，科学的精神被扼杀。

情况的根本改变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进入了新时期，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期。对于新时期的社会科学，我们特别应该注意到它新的面貌和新的特征。其一，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推动下，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他们开

始摆脱长期以来唯书唯上的观念对自己头脑的束缚，真正把社会科学看作以实践为标准的对于真理的探求。社会科学也因此不再仅仅是经典著作或某些其实并非经典的著作的注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真正闪耀着创造性思想光芒的成果。其二，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思考并说明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有助于决策和实践的意见，成为时代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一点上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社会科学也因此跟现实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加具有实践性。这两个新的特征，当然在我省的社会科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伴随着这两个新的特征的形成，新时期我省社会科学许多学科——包括一些从无到有的学科——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有的已经大大缩小了跟全国的差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人文研究都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可以说，这种大好局面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这两个新的特征生长的过程。

由于有了新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有了新时期社会科学的显著成绩，才具备了修这部志的条件。但是，要把这样一部志书编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它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体例，我们就曾费过一番思索。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在一定的篇幅之内，记载和传达按照本志的性质和任务来说是最重要、必须传达的东西，而且传达得清楚。我们最后决定从甘肃社会科学发展的实际出发，采取现在的体例，即：对于历代（古代至现代），鉴于甘肃社会科学整体水平不高而又偶有奇峰突起，我们主要通过介绍重点人物的办法予以反映。对于当代，分学科介绍。我们确定介绍某一学科根据，或者是它属于社会科学的基本学科，具有众所周知的重要性；或者是它具有甘肃特点；或者是甘肃学者对它的研究成绩突出。

本志根据当初甘肃省对各种志书的统一规定,不设上限,下限定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一年,即1990年,这自然留下了遗憾。因为,新时期我省社会科学,固然在1990年以前就已经显示了上面所说的新的特征,呈现了上面所说的大好局面,但事实是1990年以后,它的发展要比这之前更加迅速;或者说,1990年以后,我们取得了更多、更重要的成就。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社会科学也如此。方向明确了,道路开通了,然而队伍的成长,学科的建设,成果的产生,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们总是边耕耘边收获,每个时期都既有耕耘又有收获。但先须耕耘,然后有收获,所以,90年代成绩比80年代大,实属必然。但这只有留待以后新的社科志来反映了。

当然,作为一部志书,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必须符合志书的基本要求。这里首先是尊重事实。它本来是编写信史最重要的原则,也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修志所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在修志过程中。无论出于“崇高”的还是卑鄙的目的,歪曲事实,改变事实,都是不能允许的。这既违背修志的宗旨,又将使志书变得毫无意义。而社科志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比其他许多志都来得困难。因为,它面对的是社会现象,不是自然现象;它面对的虽然也有历史现象,但更主要的是尚未来得及由历史进行筛选的当前的现象。因此它必须更加谨慎地对事实作选择。这种选择,目的在于不使次要的东西淹没主要的东西,进而使事物的本来面目变得清晰,而不能相反。其次,要说明规律,然而主要是用事实本身来说明。世上举凡运动着的东西,都有一个内在规律的问题。我国社会科学,不但漫长的古代有其规律,当代短短几十年也有其规律。社科志不同于社科史,它没有专门研究和说明这种规律的任务,但是,它关于对象的叙述,却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不能只是现象的罗列和堆砌。问题在于,关于它的对象的规律,应该是通过对事实的叙述使其自然地显示出来,而不是直接作说明,还应该尽可能避免直接作说明。否则,